

詹姆斯论后现代科学与宗教

[美]M. P. 福特/文字杰/译

W. 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年)常常被视为美国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但他同时也是最早的后现代思想家之一。在詹姆斯的著作中,人们发现他打破了陈旧的范畴,并建立了崭新的、后现代的范畴。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詹姆斯思想的后现代性质,因而总是忽视了他对西方思想至关重要的贡献。

詹姆斯的后现代观点在其关于科学的著作和关于上帝与道德生活的著作中,是十分明显的。总的来说,他对现代科学的批判及其对心理现象的兴趣一直被忽略了。他关于宗教问题的观点虽然没有被简单地忽视,但在现代思想家中并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功。今天的大多数现代思想家都是休谟的忠实继承者。关于上帝的实在性、真正的宗教经验、来生、价值的存在这些问题,惟一合法的结论就是一种怀疑的结论。在许多情况下,怀疑论都忽视了关于非存在的全部论断。今天,有许多人确信,上帝并不存在,因而真正的宗教经验是不可能的;没有来生,而且也没有独立于特定文化和特定个人而存在的价值。然而,由于他与感觉论的彻底分裂,由于他接受了过程泛经验论,詹姆斯给科学和宗教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詹姆斯从来就是一个现代科学的伟大赞誉者和一个极富洞见并持之以恒的批判家。作为一名医学博士、一位解剖学教授和《心理学原理》的作者,他是一个科学的“行家里手”(insider),是一个意识到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成就和科学方法的力量并日益正确地用于增进人类知识的科学家。他写道:“科学在近300年来产生了巨大的飞跃,在整体和细节上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他在其它地方写道:“从神秘思辨转向科学沉思,犹如从精神错乱转向心智健全。”

他关于现代科学的这些论述尽管有其局限,但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得与物理主义和感觉主义密切相关。由于詹姆斯对这两种学说的拒斥,他因而成为现代科学的批评者。他关于科学的某些著作注意到了现代科学之哲学预设的根本缺陷,其它一些著作则提出了一种建立在泛经验论和彻底经验论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科学。

早在1878年,詹姆斯就表示了他对一种以物理主义和感觉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科学的相反判断。他指出:“我知道,没有什么比不加区别地将一切唯物主义的的东西都当作科学的东西更可悲了。科学不过是被清晰地表达、推理和证实的东西。那种认为科学就是《通俗科学月刊》上介绍的许多精神类型最佳之人的活动的观点,是很荒谬的。对这些人来说,科学和哲学、科学和形而上学、科学和宗教、科学和诗学、科学和情感、科学和所有使生活过得有价值的东西,永远是对立的。真相在于,科学和人类精神的所有这些功能一样,都是人对提供给他们的现象生活思考的结果。除了错误的思考与不合逻辑的思考以外,没有哪一种思维模式和任何其它思维模式是相对立的。如果我们在神学和哲学上清晰而一致地思维的话,那么我们在科学上也是健全的人。相反,如果我们的思维在一个领域中是混乱的,那么在所有其它领域也就毫无价值。”在《心理研究完成了什么?》一文中,詹姆斯以一种更为慎重的语

气提出了他对现代科学的许多同样的异议:“尽管科学在其本质上代表的只是一种方法而非固定的信念,但在习惯上,科学却被其信徒和外行们等同于一定的固定信念,即隐匿的秩序或自然完全是机械的、而非机械的范畴则是一些非理性的认识和解释方式这种信念。”

正确地说,科学只是一种方法,它无需坚持物理主义或感觉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有着批判的界限。一种拘泥于物理主义的科学或一种彻底的感觉主义思想的科学至少会由于以下原因而失败:(1)它不能说明像我们这样的自觉的存在的进化;(2)它必定会否认自由意志,因为不存在对它的经验证明;(3)因此,它必定会否认真正的伦理决策;(4)它必定会否定人自身经验之彻底的经验的证明。詹姆斯主要致力于一种机械论的实在观的道德意蕴,但也经常地在其著作的不同地方提到所有这四种异议。在指出物理主义、感觉主义的局限以及现代科学和这些学说的历史关联之后,詹姆斯提出了拯救科学的两条建议。第一,用其它类型的知识(即詹姆斯有时所说的“个人的”或“浪漫的”知识)来补充科学知识。第二,重新概念化,以便用泛经验论来代替物理主义,并扩展其经验论,以便包括彻底经验论。我将考察这两条建议,首先,从用其它类型的知识来补充科学真理这条建议开始。

詹姆斯认为,现代科学提出了这样一种实在观,它建立在一系列有限的抽象基础上,而这些抽象对特殊的目的来说又是十分重要的。(现代)科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实在而非它的各个方面。但是,除了其形式的方面以外,还有实在的“内容”:即事物之内在的本质。而且,除了属性的方面以外,还有非属性的方面:自然的那些个人的选择造成了现实差异的方面。科学只提供了一半的真理,全面的真理包括了科学真理,但又不局限于它。“宗教思想、伦理思想、诗学思想、目的论的、感情的、情感的思想(人们可以称之为个人的生活观,以区别于非个人的和机械的生活观,或是称之为浪漫主义的生活观,以区别于理性主义的生活观)一直是,甚至仍将是外在于训练有素的科学界即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形式的。”关于实在的科学视域要求的是由个人(宗教的、伦理的、诗学的、技术的、情感的、情操的)视域提供的一种平衡。撇开了这些视域,科学知识便是不完全的和会使人误入歧途的。

在《多元的宇宙》中,詹姆斯简略地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理性至少具有理智的、美学的、道德的和实践的四个层面。”理性判断乃是一种最大程度地同时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的判断。就现代科学而言,由于其感觉主义取向和物理主义取向忽视了道德的、实践的和(大部分)美学的层面,因而必须用理解实在的其它研究方法来补充。现代科学在其全盛时期也未能获得关于宇宙的全面真理。其“真理”必须被分解到最终的分析之中,但是由于其十分有限的研究方法,它未能获得关于任何事物的全面真理。詹姆斯有时又认为,最合理的观点是一种用美学真理和道德真理来补充科学真理的观点。但是,詹姆斯还提出了把科学来源于其物理主义和感觉主义观点的局限中拯救出来的第二种方法。人们可以用泛经验论代替其物理主义,并在一种更广泛、更彻底的经验论中包括其感觉知识。换句话说,科学是可以被重新概念化的。和现代科学不同,后现代科学在其真正的基础中包括了一种经验的观点。如果科学要达到其要求,如果科学就是知识或认识(正如其名称表明的那样),那么它就必须是对“我们直接遇到的事物的惟一一种形式”即人的经验的恰当说明。

詹姆斯赞成的那种泛经验论的形而上学承认:“一种个人生活的(它可以是任何一种复杂程度的、超人的或类人猿的和人类的)集体主义,即彼此不同的认识、不同的意欲和冲动,通过努力和尝试及其相互作用和积累的成就而实现的真正进化和变化组成了这个世界。”

就岩石、树木、动物和上帝都有某种经验而言,它们是类似的,但经验的层次、各自经验的内容和假说的清晰性又有着巨大的差

异。詹姆斯更多地说明的是诸如云彩和岩石以及动物和上帝之间之外在的巨大差异。例如，他可能预见到了怀特海和哈茨霍恩在个体和集体之间所做的区分，这种区分乃是以很久之前莱布尼茨做出的区分为基础的。不过，他所主张的这种泛经验论认识到了经验现实的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

在现代科学与一种泛经验的、彻底经验的和后现代的科学之间，实际的区别也许就是，后者面向研究各种被称为心理的、心灵的、灵学的或超自然的现象。詹姆斯毕生都致力于探索各种异常的心理现象，包括药物引起的幻觉、明显的思想一移情(或心灵感应)、以及明显的和死亡之交感(communiation with dead)。詹姆斯不仅对现代科学没能解释这些现象不满，而且现代科学甚至没有考察任何证据就摒弃了这些现象的存在。詹姆斯问道：“为什么考察所谓心灵感应的证据的科学家寥寥无几呢？”他回答说：“因为他们认为，正如一位现在已经去世的杰出生物学家曾经告诉我的那样，即使这种事情是真的，科学家们也应该联合起来隐瞒和掩盖它。它可能破坏自然的齐一性(uniformity)，以及所有那些舍此科学家们就不可能进行其研究的其它事情。”换言之，科学对任何违背其唯物论和感觉论范式的事物都视而不见，认为与其研究这些现象，不如斥之为先验的。詹姆斯在写给K. 斯图姆夫(Karl Stumpf)的信中说：“我相信，在对自然的调研中，不存在欺骗的源泉，它可以和一定种类的现象是不可能的这一固定信念相比较。”

坦率地说，现代科学由于其和物理主义与感觉主义的历史联系而排斥了心灵事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门不能说明任何一种心灵实在情况的科学，显然是不可能说明异常的精神状态的。詹姆斯提到的那位生物学家是部分正确的：即承认(心灵类型之)异常精神状态的存在，可能破坏现代科学理论的齐一性。人们既不能简单地把心理现象加到另一种唯物主义的宇宙之中，也不能简单地把非感性的知觉加到一种特定的样式之中。心灵现象代表了对现代科学的一种直接的挑战。

詹姆斯对心理现象的后现代态度可能最好被描述为：面向各种事实。在某些情况下，他相信事实的存在；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又不相信事实的存在。詹姆斯充分意识到，心理研究是“一个充满了欺骗源泉的领域”，但他也意识到，关于心理现象的报告和关于人类的记载一样古老，而且出现在每一种文化中。那些相信物理主义和感觉主义的人必定会拒斥心理现象，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排除了非感性经验的存在。然而，由于詹姆斯既不是物理主义者，也不是感觉主义者，他便自由地面向了他们可能证明的任何事实。

显然，在《心理研究已完成了什么?》一文中，詹姆斯认识到，心理研究要求的不只是现代科学研究范围之简单的扩展，它要求的是科学的一种根本的重新概念化。“科学(就科学否认了这些异常事实而言)好像将它们隐藏在灰尘之中；而且，我现在感到最迫切的理智需要是，以一种这些事物在其中可能具有一个确定地位的方式重建科学。”如果科学就是去理解心灵现象的话，它必须重新考虑它的基础，即“以一种这些事物在其中可能具有一个确定地位的方式重建科学。”它既不能简单地被扩大到包括这些现象，也不能只是用其它真理补充。

一种以泛经验论和彻底经验论为基础的科学也许是这样一种科学，其中各种异常事件也和正常事件一样都有一个确定的位置。如果实在不过是由经验实体组成的，如果存在着比感觉经验更根本的经验模式，那么对心灵现象的各种解释都是可能的。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科

学可能把这些硬邦的常识概念说成是个人的经验，即实在而非自我的存在以及因果关系。这些都是现代科学必须预设的概念，但是，只要把自我局限于物理主义和感觉主义的学说，就不可能给出任何说明了。

那种认为詹姆斯对现代科学的主要异议源于其未能研究各种明显的心灵事件的说法也许是错误的。至少是在其早期和成年时的大部分时期，詹姆斯对现代科学的主要异议是，与其相关的认识论未能提供对实在之伦理的、宗教的和美学的层面的支持，而且实际上倾向于否认实在的这些方面。只要伦理的直觉、自由的决策和宗教的经验(还应该加上对关系的经验，以及对某物之非感觉的意识)被认为是心灵体验，即正在落入现代心理学领域之外的经验，那么现代科学就不可能说明心灵现象。但这并不是“心灵的”这个语词之习惯的用法。詹姆斯对现代科学的主要异议是，它未能说明实在之个人的方面，即宗教、诗学和美学这个主题。现代科学拒绝考察各种异常经验，不过是其对物理主义和感觉主义所承担的义务的一个例证。

对他自己的两条建议，即用其它真理来补充现代科学，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重新认识科学，詹姆斯更倾向于哪一条尚不很清楚。第一条建议之明显的优点是，它不要求对科学的组成部分有任何根本的改变，它的全部要求就是承认其真理天生就是有限的和部分的。第二条建议的优点是，它可能导致一种更为恰当的科学，即一种可能支持伦理直觉、自由意志、情感、宗教经验、审美享受、对因果性和其它关系的感受、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意识和各种非感性知觉(包括心灵知觉)的实在的科学。总之，第二条建议的优点在于，它允许在所有体验到的复杂性中对实在有一种整合的理解。我想，至少是在其更彻底的或后现代的基调中，詹姆斯倾向的是这一种方法；而在其更保守的或现代的基调中，他倾向的是第一种方法。

詹姆斯的后现代观点特别表现在他关于上帝与道德生活的关系的思想中。从一种现代的观点看，上帝和道德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可疑的论题。如果一切事物最终都是物理的，如果所有知识都是通过身体的感觉得到的，那么谈论上帝或者是谈论对和错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正如詹姆斯主张的那样，如果一切都不只是物理的，如果一切事物都有某种个人的或经验的方面，如果以感觉为中介的经验只是人类经验的一小部分，那么谈论上帝、道德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可能是有意义的。

詹姆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于上帝的直接体验，某些人还具有特别生动的宗教经验，但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在某一种层次上体验了上帝。詹姆斯指出：“对我们的存在的进一步限制陷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层面(它来自可感的和完全可以理解的世界)。我们称之为神秘的领域，或神奇的领域，或你选择的任何一个领域。……至少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上帝乃是自然的名称。”上帝的存在不只是一个假定，在詹姆斯看来，上帝的存在还是一个经验事实。上帝被认为是存在的，因为上帝被领悟到了，即使不是通过五种感觉中的任何一种被领悟的。

詹姆斯似乎要证明：即使不存在上帝的经验证明，人们还是有权信仰上帝，而且具有这种信仰是健康的、正常的，在理智上是可辩护的。在他的《信仰的意志》(他很遗憾没有起名为“信仰的权利”)一文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人选择完全舍弃上帝或未来，没有人能阻止他；没有人能超越理性怀疑他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有其它想法并按他想的那样去做，我不认为任何人能证明他是错误的。每个人都必然按照他认为最合适的方式去做，而且，如果他错了，对他更不利。”信仰上帝是合法的，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不能被证明为是假的。

但是，信仰上帝的权利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有或可能有积极的用处。信仰一定的上帝——一个和我们一起为了善而劳作的有限的上帝的概念，在我们当中激发了一种十分有用的“狂热情绪(strenuous mood)”。这种狂热情绪的能量如此之深地贯穿于我们自然人的各种可能性之中，以致即使没有信仰上帝的形而上学依据或传统依据，人们仍可能简单地假设一个生活艰辛的借口，并避免这种狂热之最强烈的可能性的存在的游戏。每一种能量和忍耐，每一种勇气和对付生活之恶的能力，都在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当中得到了释放。因此，在人类历史的战场上，这种狂热型的性格意志总是比随和型的性格意志要持久，而且，宗教将把非宗教逼至绝境。”信仰一种上帝之所以是有用的乃是因为，生活富有挑战和意义，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必要的资历(wherewithal)。

詹姆斯绝没有把他的信仰上帝在理性上是可以辩护的和有用的观点，与信仰上帝在彻底经验的基础上是正当的观点联系起来。他从没有明确地说，信仰上帝在理性上是可以辩护的和有用的(正常的和健康的)，上帝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每个人的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他这样说的话，那么詹姆斯在《信仰的意志》中对上帝存在的主要论证的判断当然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广泛传播。事实上，詹姆斯关于上帝存在的主要“论证”(如果人们想用这个语词的话)乃是基于对上帝的直接经验的一个复杂论证。

詹姆斯的世界观中包括了上帝这一事实本身并没有使这种世界观成为后现代的。实际上，许多思想家都会假定，他对上帝的容纳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前现代的。使他对上帝的思考成为后现代的乃是他对上帝的特殊理解。詹姆斯得出结论说，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在整体上也不是超验的，而且上帝是不受人的活动影响的。在拒斥上帝的全能、绝对超验和冷漠性的同时，詹姆斯也拒斥了前现代有神论的三个主要信条。

詹姆斯似乎从未想到过怀疑上帝的善是可以理解的。詹姆斯认为否认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上存在着恶，那么对它的解释必然表明上帝控制事件之有限的能力。他写道：“我相信，惟一名副其实的上帝必定是有限的。”他在《多元的宇宙》中指

出：“摆脱悖论和困惑的惟一途径，乃是一种一贯慎思的一元论的宇宙(它经受了神秘的‘堕落’，即从实在堕入现象，从真理堕入谬误，从完美堕入缺憾，简言之，堕入恶)。我认为，摆脱所有这一切的惟一途径，就是坦陈多元论的观点，并假定超人的意识(上帝)，尽管它可能是巨大的，本身就有外部的环境，而结果则是有限的。”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包的，如果上帝对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每一个细节负责，那么人们就必然会认为上帝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所有原罪或罪恶负责。上帝在世界上活动，但上帝不是惟一的活动者。

在对上帝的有限力量以及诸如我们自己这些非神的存在的相关力量作出这种明确肯定的同时，与传统有神论相反，詹姆斯还强调上帝在世界上的包容性。他拒斥了那种黑格尔式的先验的一元论，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没有力量在世界上产生各种影响。詹姆斯绝没有否认上帝在某些方面是先验的，但他同时相信上帝是内在的。如果上帝完全是先验的，上帝就既不会被体验到，也不会发生作用。詹姆斯写道：“先验论者喜欢‘灵魂至上’这个语词，但作为一个规则，他们在一种理智主义的意义上使用它，只用来表明一个交流的中介。‘上帝’是一种因果的动因，也是一种交流的中介，这就是我想强调的方面。”上帝不仅在世界之上，上帝就在世界之中。

詹姆斯的后现代上帝观的最后一个特点是，上帝是受各种非神存在的自由作用影响的。古典神学家一直认为，上帝是冷漠的，即缺乏回应世界的感情。坚持上帝可能受难，因而可能感受，就是肯定上帝在某种意义上是被依赖的，因为感受者是依赖于感受的对象的，而且依赖性一直被认为是低于自足性的。但是，詹姆斯推论说，如果人类不能影响神的生活，如果上帝对人的决定、活动和感觉漠不关心，那么任何东西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什么使得生活富有意义?》一文中，他写道：“我承认我不明白，为什么一种无形的世界秩序的真实存在不能部分地依赖于个人的回应(我们任何一个人人都可以提出这种宗教要求)。总之，上帝自身可以从我们的忠诚中汲取生命的力量并增进真实的存在。就我自己而言，我不知道这种生活的血汗和悲剧意味着什么，如果它们意味着这其中的任何一种东西的话。”如果我们的所作所为对这个惟一永恒的存在没有产生某种影响，那么我们最终所做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与其在古典有神论的模式之后把上帝想像为完全自足的，詹姆斯宁愿认为上帝“可以从我们的忠诚中汲取生命的力量”。上帝影响着世界，而且也受到世界的影响。

(M. P. Ford, “James On Poatmodern Science and Religion”, 原载: Founders of Constructive Postmod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曲跃厚校译, 责任编辑: 鲁旭东)

[回主页](#)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 100732
电话: (010)8519507 传真: (010)65137826